

春暉集

哲 明





作者简介

哲明，原名李哲明，又名李永应，福建石狮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时侨居菲律宾，1953年归国。195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毕业后从事文艺编辑和文艺理论工作。著有孙犁文艺思想研究系列论文，《孙犁的文艺批评观》《孙犁的风格论》先后荣获天津鲁迅文艺奖；《孙犁的美学思想》获1989年全国新文艺研究论文一等奖。主编《天津文艺理论十年》。与人合译（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现任天津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编审，兼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理事，天津艺术学会常务理事，天津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

目 录

鲁迅论文艺批评·····	(1)
蔡元培论美育·····	(12)
孙犁在新时期对文艺理论的贡献·····	(23)
孙犁的美学思想·····	(40)
孙犁的文艺批评观·····	(51)
孙犁的风格论·····	(68)
孙犁的诗论·····	(79)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84)
真实性与理想性浅谈·····	(96)
“写本质”琐议·····	(99)
评长篇小说《烽烟图》·····	(105)
傲霜斗雪花更红·····	(113)
——评《战斗的青春》	
读《九庄奇闻》随想·····	(119)
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	(125)
评长篇小说《吉鸿昌》·····	(133)
浅评长篇小说《“圣战者”的覆灭》·····	(140)

浅谈《琵琶情》的艺术特色·····	(149)
谈《庚子风云》·····	(158)
民族意识与当代意识的统一·····	(161)
——读张承志的部分小说有感	
赞《明姑娘》·····	(168)
谈《螺旋》的思想和艺术·····	(173)
真实地描绘了新一代大学生的追求·····	(178)
——给张圣康同志的信	
白云飘香意绵绵·····	(182)
——《送你一片白云》读后	
漫评中篇小说《园丁》·····	(186)
开掘生活中的美·····	(192)
——读中篇小说《美》	
读《菊花鲜》随感·····	(197)
爱情·伦理·道德·····	(200)
——读中篇小说《共饮一江水》	
读《小小浪花飞》随想·····	(205)
热情讴歌“四化”建设的创业者·····	(209)
——读王江的三篇短篇小说	
新的突破 新的收获·····	(216)
——喜读小说《鼠精》	
《庭审》断想·····	(218)
新时代的交响曲·····	(221)
——读报告文学《多彩的年代》等	
美的赞歌 爱的心曲·····	(226)
——读谢大光的散文集《落花》	

美的情思 新的意境·····	(235)
——读散文集《鄂伦春风情》	
谈《蝴蝶杯》的主题思想及其他·····	(238)
时代精神的赞歌·····	(244)
——评四幕话剧《分忧》	
喜看独幕话剧《追求》·····	(251)
文学和传记·····	(255)
文学和心理学·····	(264)
文学和社会·····	(285)
小说和戏剧：宏大的结构·····	(311)
悲剧和喜剧·····	(330)
神话和原始模型·····	(362)
论冯骥才的小说艺术·····	(388)
后记·····	(398)

鲁迅论文艺批评

鲁迅不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艺批评家。他一生从事过大量的光辉的文艺批评的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文艺批评的见解，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文艺批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我们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学习榜样。

一

鲁迅经历了长期的文艺斗争实践，深刻地认识到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他说：“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华盖集·并非闲话〔三〕》）明确地指出了革命文艺批评的战斗任务。

文艺领域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恶草，即反动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想，代表着没落腐朽的旧意识和旧事物，你不剪除它，它就会滋生泛滥，代表着革命的新意识和新事物的佳花，就会失去生长的地盘。要使佳花得到健康的成长，就必须不断地剪除恶草，这是革命的辩证法。鲁迅曾经说过，“既有空地，

就会生长荆棘和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培植，或在删除”，使之“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鲁迅战斗的一生，始终不渝地同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文人进行坚决斗争。他在文艺领域内，积极而正确、广泛地运用文艺批评的武器，粉碎了封建主义的“国粹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资产阶级的“自由人”，“第三种人”、所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人性论”等反动理论。反动文人们对革命的文艺批评，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进行了种种的污蔑和攻击。鲁迅揭穿了他们的卑鄙伎俩：“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妄图取消批评，调和斗争。鲁迅严肃地指出：要是取消了批评，文艺就成为“平安的古冢”，“怎么会有生人气？”（《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坚持旗帜鲜明的战斗的文艺批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就是以这种是非分明，爱憎热烈的批评斗争，剥下了敌人的种种伪装。挫败了他们妄图破坏革命文艺运动的无耻阴谋。

鲁迅的战斗的文艺批评，对于“剪除恶草”，是投枪和匕首，从不手软，但对“灌溉佳花”，却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和心血。他曾生动地比喻说，菊花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经过园丁的辛勤浇灌和培植，这“细碎的野菊”才成了菊花这样的“佳花”（《华盖集·并非闲话〔三〕》）。在鲁迅看来，天才固然重要，但培养天才的泥土更重要。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倘无好泥土，是“长

不出好花和乔木来”的（《坟·未有天才之前》）。他热烈地赞扬那些为发展革命文艺创作，“宁愿作为无名之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鲁迅对文坛上的新苗，总是怀着爱护的心情加以照料。他说：“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二心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他憎恶那些“在嫩苗地上驰马”的“恶意的批评家”。这些人“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并非闲话〔三〕》）鲁迅认为新苗必须在园丁的辛勤培育下，才能茁壮成长。他说：“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在他战斗一生中，为帮助青年作者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他早期编辑《乌合丛书》、《未名丛刊》、《莽原》周刊、《语丝》周刊起，直到后期编辑《奔流》、《萌芽》等刊物，对青年作者的作品，“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常常整天没有休息”。（《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他热切地希望青年作者们努力上进，诚恳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对他们谆谆善诱：“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期望他们“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鲁迅译著书目》）他还勉励大家，要做到：“（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鲁迅书信集·致胡今虚信》）。鲁迅是我国革命文艺园地的一位伟大的园丁。他那辛勤地“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战斗一生，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文艺批评是文艺界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它是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有着鲜明的党性。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或一种文艺思想是佳花，还是恶草，各个阶级都有各自的批评标准。因此，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鲁迅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也是非常重视的，曾经用“圈子”和“尺”来作比喻。他主张文艺批评“须有一定圈子”。如果没有一定的“圈子”，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对批评便莫衷一是，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那些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阶级谬论的好汉们，攻击鲁迅的正确主张是“用一个一定圈子向作品上套，合就好，不合就坏。”鲁迅给了他们有力的驳斥：“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反对那种认为文艺批评不应该有标准的看法。他指出：文艺批评总是有一定的尺度，只是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尺而已。他说：“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至于革命的文艺批评的标尺，他认为：“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而“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那种否定文艺批评有一定标准，宣传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

观点是错误的。

鲁迅所说的“圈子”和“尺”，就是文艺批评的标准。他认为：在观察、分析和判断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想时，首先是在内容上分清敌友、“明确是非”的政治标准。鲁迅对林语堂等人的“幽默”和歌颂“铁血”的“民族主义”文艺，进行无情的抨击。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对那些为维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而粉饰现实，制造瞒与骗文艺的文人墨客，给以了极其尖锐的批判。同时，鲁迅也反对那些小资产阶级歪曲真实的政治内容错误的作品。他说：“这样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的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不但强调革命的文艺作品要有先进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强调必须有优美的表现形式。他认为，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力量的。他明确地指出：对任何创作来说，都“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鲁迅书信集·致李桦信》）。鲁迅十分重视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极力提倡文艺作品必须是“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鲁迅针对那些没有艺术性的“标语口号式”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鲁迅关于文艺批评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三

文艺批评有了明确的战斗任务，有了正确的批评标准，还需要有科学的批评态度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工作，必须把科学性和战斗性结合起来。没有科学性的理论，就会丧失战斗的力量。鲁迅的文艺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既注意了严格的科学性，又富有强烈的战斗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科学性和战斗性相结合的典范。

鲁迅对文艺批评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那种“滥用了批评的权威”的“批评家”。他指出：他们“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认为，这种“失了批评的态度的”批评，“愈多反而愈坏。”（《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同批评的“滥用”相联系的，就是文艺批评上的“乱捧”和“乱骂”。“乱捧”可能“捧杀”。“乱骂”可能“骂杀”。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捧”和“骂”，而在于“乱捧”和“乱骂”。鲁迅指出：“所谓捧和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象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这种乱骂与乱捧的结果，“不是捧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对革命文艺是十分有害的。鲁迅认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鼓励批评家“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

加以排击”（《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些都表现了鲁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对文艺批评采取了全面的、历史的和发展的科学分析的方法。他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这里所说的“顾及全篇”、“顾及全人”和“顾及社会状态”，就是要求文艺批评必须从作家和作品的全面和整体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而不能脱离评论对象所反映的客观现实，不能脱离开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不切实际的判断和评价。鲁迅指出：“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说：“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他极力反对那种脱离实际，断章取义，以局部代替整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反科学的文艺批评。为了说明几个顾及对全面评价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品的重要性，他举例说：“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太久了”。但“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因此，“倘有

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在这里所阐述的道理，对于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鲁迅对文艺批评的科学态度，还表现在他提倡用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评价作家和作品，有缺点和错误就帮助提高，反对那种“求全责备”的做法。鲁迅极其憎恶那些资产阶级文人以所谓“普遍”，“永久”，“完全”为幌子，对革命文艺作品吹毛求疵。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为了保护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对那些扼杀新生事物的“求全责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一定是难免的。”（《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完全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幼苗。他说：“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坟·未有天才之前》）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坟·摩罗诗力说》）那种形而上学地苛求革命文艺绝对完全、完美，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鲁迅认为文艺批评要做到真切，就必须克服那种“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绝对化的观点。他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

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太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淮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这种对文艺作品细致分析的方法和慎重态度，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四

鲁迅认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就需要有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装起来的文艺批评家的队伍。他说：“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鲁迅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批评的指导作用，期望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批评家的诞生。他说：“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我们要批评家》）。“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文艺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鲁迅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文艺批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意义。他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鲁迅书信集·致韦素园信》）因此，他强调指出：必须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译文序跋集·〈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为了传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好让中国的批评界更多地接触和学习，他积极翻译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到中国来。他希望文艺批评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新的事实，新的现象”（《伪自由书·透底》）。

文艺批评是文艺斗争的重要武器。健全的文艺批评对于文艺创作的繁荣，对于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和文艺工作者的成长，都是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文艺批评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坚持不懈地使用批评的武器，对那些有错误倾向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想，进行及时的、理直气壮的、有说服力的批评和斗争。批评家是作家亲密的诤友，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剖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揭示出它的社会意义，指出它的成败得失，“催使它走向正确的、前进的道路。”（《我们要批评家》）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作家对所反映的生活一般说来是熟悉的，但是，有时由于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上的原因，对生活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以及对文艺创作的规律的掌握，“却未必便是‘正确’”的（《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因此，评论家对作品必须“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淮风月谈·关于翻译（上）》），“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当然，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对同一作家和作品，人们可能存在不同看法，这里有正确与谬误之分，也可能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文艺上的不同见解，必须开展充分的争鸣。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任何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文艺批评工作也是一

样。他说：“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只有通过共同探讨，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这样做，“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促进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发展的动力。作家、批评家要开展正常的批评和我自批评，“才能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鲁迅热切地希望批评家养成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既要敢于批评，又要善于批评，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水平，促进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和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蔡元培论美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重要的历史时期，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大力倡导美育，传播美育理论，并把美育确立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教育方针，为创立中国近代的美育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蔡元培继承了我国古代美育的传统，并接受了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把美育确定为新式教育方针的内容之一。一九一二年，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①一文中，主张学校教育应当包括五育：即军国民主义教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美育（毗于德育）、世界观教育（统三者而一之）。他认为这五育是相辅相成的，“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他说，“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他